

林文仁  
●  
著

# 南北之爭與

# 晚清政局

1861-1884

以軍機處漢大臣爲  
核心的探討



出版社

# 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

1861-1884

● 以軍機處漢大臣爲核心的探討

林文仁 著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：1861~1884：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/林文仁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5.7

ISBN 7-5004-5125-3

I. 南… II. 林… III. 人事制度 - 研究 - 中国 - 1861~1884 IV. D691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9041 号

责任编辑 王 浩

特约编辑 陈 曦

责任校对 韩天炜

封面设计 毛国宣

版式设计 王炳图

---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

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

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7.25

插 页 2

字 数 186 千字

定 价 17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序

林能士

林文仁教授的碩士論文《南北之爭與晚清政局（1861—1884）——以軍機處漢大臣為核心的探討》，經過修改與補充后，即將出版。忝為論文指導教授，我十分樂於向讀者們鄭重推薦這部行文沉潛細致，并能生動刻劃晚清政局歷史圖像的佳作。

有關晚清政治史的研究，以往學者們對於鴉片戰爭、英法聯軍、洋務運動、太平天國，到甲午戰爭、戊戌變法、庚子拳變等重大歷史事件，都曾發表過許多專著或論文，詳加討論。晚清政治發展的整體輪廓，因此逐步清晰可見。同時，諸如“中/西”、“新/舊”或“傳統/現代”等涇渭分明的觀點，也往往成為透析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時不可或缺的概念。林文仁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，另辟蹊徑。依地緣關係上的“南/北”入手，從筆記、日記和文集等私人記述的史料，鉤沉晚清史事，論述由“辛酉事變”為起點，以“南/北”之爭的派系問題為主軸，探討1861—1884年間清朝決策核心人事布局的內部變化，實有其獨到之處。

林文仁教授的研究，一向是建立在清代檔案史料、私家日記、筆記掌故等，廣泛涉獵和長期關注的基礎上。全書涉及的史料層面甚廣博，然彼皆能靈巧遨游其中，不至身陷龐然的文字迷障。本書成功的首要因素，我認為，即在林教授既能潛心於史料考證，又能清晰明辨，有效地部勒群籍，並且兼具見微知著、鞭辟入里的眼光，配合上精緻縝密的筆法，勾玄提要，終而譜寫完成獨樹一幟的晚清政治史圖像。

林文仁教授自入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，踏入史學領域以

來，轉眼間已屆十五年。眼見他由一位辛勤耕耘的歷史學子，至今在晚清政治史的研究領域里成爲一名學有專精的年輕學者，誠然令人喜悅。林文仁教授的成功，除了先天好學深思的稟賦，與后天淬勵奮發的努力之外，整體環境的適切助力，也是功不可沒。在林教授的求學階段中，除接受系上老師們的灌輸薰陶外，適逢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交流漸趨開展，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開風氣之先，曾陸續禮聘章開沅、韋慶遠、濱下武志、汪榮祖等多位名重一方的學者蒞校客座。可以說，林教授在這些有的利條件下，得以悠游史學之林，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另開新徑。相信未來林教授必然會大展長才，發表更多令人期待的研究佳作，開拓出一道嶄新的學術之路。

是爲序。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緒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一、研究動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二、本文架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4)   |
| 三、研究成果與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| (15)  |
| 第一章 辛酉政變與南北派系的浮現             | (21)  |
| 第一節 造成政變的基本因素                | (22)  |
| 一、曲折的傳位過程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)  |
| 二、由友愛而見惡的兄弟關係                | (25)  |
| 三、肅順的崛起與其行事                  | (29)  |
| 四、慈禧皇太后的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| (35)  |
| 第二節 南北地域因素與“辛酉政變”的關係         | (38)  |
| 一、辛酉之前南士與北士的地位               | (39)  |
| 二、南北門戶在辛酉政變中的作用              | (42)  |
| 第二章 李、沉入樞與南北派系的發展(1865—1867) | (50)  |
| 第一節 初期的人事升沉                  | (50)  |
| 第二節 恭王見黜與李鴻藻的入樞              | (56)  |
| 第三節 恭王對北派成見的加深               | (64)  |
| 一、李鴻藻拒奪情之爭議                  | (65)  |
| 二、“同文館”擴大取才之爭議               | (69)  |
| 第三章 南北之爭的白熱化(1870—1878)      | (74)  |
| 第一節 政策面的對立——天津教案             | (75)  |
| 第二節 南北平衡格局的危機——王文韶入樞         | (85)  |
| 第三節 派系鬥爭的惡化——沈桂芬簡黔撫案         | (90)  |
| 第四章 派系對立的再升高(1879—1882)      | (102) |

---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節     | 清流黨勢力的坐大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103) |
| 第二節     | 崇厚使俄案：南北勢力消長的轉折點·····     | (113) |
| 第三節     | 雲南報銷案——南派勢力的重挫·····       | (127) |
| 第五章     | 南北派系格局的瓦解(1882—1884)····· | (146) |
| 第一節     | “倒恭用醇”路綫的形成·····          | (148) |
| 第二節     | 甲申的朝局大變動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156) |
| 第三節     | 清流黨解體與南北之爭的中輟·····        | (179) |
| 結 論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8) |
| 附錄一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2) |
| 附錄二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4) |
| 附錄三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6) |
| 附錄四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8) |
| 附錄五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00) |
| 征引及參考書目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13) |
| 后 記     | 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4) |

# 緒 論

## 一、研究動機

“黨同伐異”一端，時不分古今、地不分中外，向是政治活動中必然存在的現象。多數時候，它甚至是政治行爲的唯一內涵。不可否認地，朋黨派系間的互動，往往是將千頭萬緒的政治事務歸納出原則，妥協出具體實行步驟的有效途徑，只是一旦由政策上的歧見發展成權勢的衝突，進而互結門戶、動蕩政局，矛盾愈深，終成意氣之爭，其形成“製造政治動亂，窒息人才流通，扼殺社會進步”<sup>①</sup>的負面效果，也就不難想見。

由歷代政爭的成因去分析，“地域”因素無論在任何一個斷代的研究者來看，都是主要的觀照點。北朝至唐初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的對抗、唐中葉的“牛李黨爭”<sup>②</sup>、北宋初期的“慶曆黨爭”及中期的“熙寧黨爭”<sup>③</sup>、南宋紹興前期和戰之議<sup>④</sup>，下至明

---

① 朱子彥、陳生民：《朋黨政治研究》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頁。

② 有關此一問題的研究，首推著名的史家陳寅恪。陳氏之著作中，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（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）中篇《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》，述之尤詳。

③ 相傳宋室有“不相南人”之教戒，且宋初亦確不以南人爲相，每一有南人相者，輒起政爭。錢穆曾引部分宋代史料印證此現象。參看錢穆《國史大綱》（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）下冊第六編第三十三章《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》，第435—442頁。

④ 參看寺地遵著，劉靜貞、李今芸譯：《南宋初期政治研究》，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。



代的東林與閩黨之爭<sup>①</sup>，都被研究者指出地域因素所發揮的作用。尤其在宋代以後，由於黃河流域政治勢力的混同與南方經濟力量的成熟，地域因素的主綫由原來的東西對抗，轉為南北競爭<sup>②</sup>，遂使問題更加無朝無之。加上科舉制度自於宋代得到擴大，下至明、清已完全成熟為中國社會階級流動主要管道後，盤根錯節的師友、年誼、僚屬關係及其背後存在的政治、經濟利益，使得派系成分愈見複雜。儘管如此，地域因素在此中所占比重，並未降低，反而是變得更豐富了。這一點在清代的南北之爭中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。

研究清初史事的學者，往往提及八旗政權入關後，之所以能迅速掌握局面，使政治發展步上軌道，明末原屬閩黨的北派士大夫之合作，是一重要因由<sup>③</sup>，也在這樣的條件下，清初順治、康熙兩朝，北派士大夫能挾此優勢，在軍事攻伐之外，屢興大案，重擊南士，其中以“奏銷案”、“哭廟案”、

① 關於此一說法，吳晗：《宋明間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》（載《新建設》1959年3月號，第20—21頁）一文，最常被提及。此前，美國學者賀凱（Charles Hucker）曾依《東林黨人榜》、《東林點將錄》及閩黨人物相關資料去作籍貫分析，而得出並無明顯地理因素對立成分的結論。不過，作者以為此似即一反映計量方法在歷史研究中之局限性的實例。明、清兩代以地域因素為根本之黨爭，因科舉制度發展之完備，已加入許多複雜成分，如師生、年誼、僚屬利益等，因此集團成員未必在地域上呈一面倒之勢。但若更進一步，由領袖成員之地域成分作排比，南北之別仍然鮮明。

② 在傅斯年《夷夏東西說》（收於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：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》，1933年版）一文中，將東漢曹袁官渡之戰，視為結束自上古以來，夷夏東西互動混同過程的一個里程碑，此後則大勢由東西對峙，而漸轉為南北對峙。唯一般史家普遍仍以“安史之亂”後至宋朝建立，為南北對峙格局確立之始。

③ 美國學者魏斐德（Frederic E. Wakeman, Jr.）在其所著，陳蘇鎮等中譯的《洪業——清朝開國史》（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）一書中，對此有多處論及。尤其該書第六章《清朝統治的建立》內“北人與南人”一節（第398—408頁），述之最詳。

“丁酉科場案”最具代表<sup>①</sup>。康熙中期以後，歷雍、乾兩朝，清廷中央表現了天下大定後，君主集中權力，主導政局的強勢作風，已非立朝之初，須藉漢士原有矛盾以收操縱之實的階段可比，派系鬥爭遂一定程度地受到抑制。嘉道守文，雖中央已乏英主，政治風氣亦漸現如曾國藩所云“掩飾彌縫，苟且偷安”之貌，但還能維持一基本局面。一旦內外交攻，大勢漸脫君主全面掌控的格局之外，官僚集團之勢漸升，而政爭便不可免了。值此，南北地域成見，再出作祟，甚且取重於國朝利益，影響深遠。有一個較常被提及的例子：咸豐初，權相穆彰阿被黜，山西壽陽祁雋藻以體仁閣大學士兼管戶部事務為首揆。祁氏著有學名，但迂闊而無遠識，總理樞垣一無成績。當時滿軍機大臣文慶曾於御前進言，以為當重用漢人，破除成見，帝均一一接受。其後曾國藩起鄉勇以擊太平軍，初時屢敗，祁氏在帝前即誅之再三，反是文慶每進言“國藩負時望，能殺賊，終當建非常之功”，時加維護，終於有咸豐四年（1854）湘軍出湖南，收復武漢諸郡之捷音。咸豐帝聞佳音，喜形於色，謂軍機以“不意曾國藩一書生，乃能建此奇功”！不料祁雋藻竟對以“曾國藩以侍郎在籍，猶匹夫耳，匹夫居閭里，一呼，蹶起從之者萬餘人，恐非國家之福”。咸豐聞言色變，久久不已。而曾氏亦幾終文宗一世，不得其志七八年也<sup>②</sup>。祁氏之以同為漢人，而對文正屢加誹謗，乃至不顧國朝之危及漢士政治勢力之升沉可能，皆足以說明漢士派系之爭已有再起之勢，而北士以居執政之有利地位，較易布局，這點可由咸豐朝後期，軍機漢員除老衰致仕之彭蘊章，及滿洲正白旗出身的穆蔭外，少壯當事之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俱為北士，且

<sup>①</sup> 清史研究先行者孟森，對各案俱曾有文章考述，見其《明清史論著集刊》，南天書局1987年版，第391—452頁。

<sup>②</sup> 吳相湘：《晚清宮廷實紀》，正中書局1988年重排新版，第4—5頁。

於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七月文宗駕崩時被全數指定為受顧命的“贊襄政務大臣”，成為新權力核心看出端倪。如此格局，與其時文宗身後權臣肅順與恭王奕訢兩派之權力鬥爭相結合，終為往後歷同、光兩朝，漢士大夫集團在中央決策體系內所開展的南北之爭創造了時機。再加上太平軍之役後，表現在中央決策體系與地方新興實力圈內滿漢勢力消長的趨勢，更使漢士大夫集團內派系鬥爭，對內外決策的影響，較有清一代前此任何時期都高。這段南北派系的分合，以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“辛酉政變”為起點，到光緒十年（1884）中法戰爭為一個階段。本文即試圖以這廿四年中，南北兩派在作為決策核心的軍機處，透過朝局中重大內外決策、事件的討論、爭執及政治角力，來呈現諸多史著或史料在提及此段歷史時，常用“南黨北黨”<sup>①</sup>等詞，其真實面目及在晚清政局中所佔有之地位。同時也用以說明：同光之際所謂“南北之爭”，絕非後人歸納史事所逕造之新詞，而是一種真實的政治現象。尤其，此時所謂南黨、北黨云云，已非過往歷朝一種較抽象之概念，易言之，不祇是一種文化或價值觀差異所帶來的歷史成見而已，更是政治行為中最直接的權力爭奪。因此，本文的寫作動機，與論析南北地域、文化差異和政治認知關係者的用心不同，這是作者在此必須先加以說明的。

## 二、本文架構

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九月之“辛酉政變”，得成南北派系對

<sup>①</sup> 如胡思敬：《國聞備乘》卷二，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，收在《退廬全集》第四冊，總第1835—1836頁，即有“南黨北黨”一節，述其大要；再如李慈銘：《越縕堂日記》，文光出版社1963年影印版，以南北冠於人或黨稱者，所在多有。

峙格局再起之因，已如前述。由於政變勝利的一方——恭親王奕訢陣營，在密謀籌劃的過程中，得南士運作之功甚大<sup>①</sup>，而被瓦解的肅黨顧命陣容中，盡為北士，遂使恭王與兩派之間的關係，由一開始便有了差異，此種差異在往後軍機以恭王為首的廿四年間，因政治立場與施政理念的不同，而擴大效應，終於在某些關鍵時刻，促成了南北派系間裂痕的進一步加深，因此，本文第一章“辛酉政變與南北派系的浮現”，將就“辛酉政變”的淵源，作一個清楚的介紹，並且勾勒出此政變對南北派系浮上檯面所產生的影響。在談及政變淵源時，本文將用一定篇幅說明恭親王奕訢及其政變的主要支持者——慈禧皇太後。這除了是要清楚交代此歷史事件外，主要也着眼於南北派系之成，在恭王之政變及其後之權力平衡安排；而南北派系格局之折傷於光緒甲申，慈禧的操縱與利用，是主要原因。作者希望在本文之初，即將主要關係人帶入本文，或有助於呈現此中所存之人事網絡。

政變既成，恭王因前此與兩宮太后達成以贊成垂簾體制換取執政之地位，加“議政王”銜負責重組軍機。初時新軍機中共有六大臣行走，除恭王及其岳丈文華殿大學士桂良，以及恭王兩位長期追隨者戶部左、右侍郎文祥、寶鋆四位滿臣外，餘兩漢缺，則分畀江陰曹毓瑛及錢塘沈兆霖。曹毓瑛在政變時以軍機章京達拉密（領班）身份，扈從在承德，於其中聯絡籌劃，功勞最著，亦深受恭王倚信；沈兆霖為戶部尚書，政變前即與肅黨不和，對肅順阻撓文宗回鑾，抨擊尤力，政變中與文、寶二人合作，亦發

---

<sup>①</sup> 其中以江陰曹毓瑛、仁和朱學勳、許庚身及儀徵方鼎銳四人，以軍機章京之有利地位，發揮最大作用。見高陽（許晏駢）：《同光大老》，皇冠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1頁。

揮相當作用，此時入樞，酬庸較重<sup>①</sup>，也一定程度凸顯了恭王對南士助成大功的共榮之意。不過，勝利的歡欣與圖求朝局長遠發展的理念相較，畢竟是短暫的，隨着不及一年後人事的興替<sup>②</sup>，軍機陣容再次做了調整。原由沈兆霖所占漢缺，於同治元年（1862）由出身河南省內的左都御史李棠階入樞行走。從此“南北同治”軍機之局，開始確立。此後直至光緒甲申，除極少的過渡階段，軍機漢員南北各一的格局，一直沒有變化<sup>③</sup>。

不過，就同、光之際南北派系的開展而論，李棠階只能祇是一個過渡人物，彼於同治四年（1865）十一月下世後，朝命由時在弘德殿行走的帝師，內閣學士直隸高陽李鴻藻入軍機學習行走，這才真正成為北派立戶之始。李鴻藻由於春秋正盛，且以帝師為兩宮所重，由此至光緒甲申軍機全班盡罷前，幾乎一直身處權力核心的軍機<sup>④</sup>。這不啻為其成為北派宗首創造了良好條件。但也正是在同治四五年中，由於恭王被奪“議政王”銜的政潮，與李鴻藻拒奪情所一度造成的僵局，使恭王與李鴻藻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便產生了摩擦，也植下了恭王對北派的成見陰影。加上同治六年（1867）恭王奏請成立“同文館”之“天文”及“祿學”館，並擴大揀擇人才一事，遭到以保守派大老倭仁為首的官

① 沈兆霖於受命後，旋差赴蘭州勘事，並於同治元年正月署陝甘總督，七月於返京途中因遇山洪而殉職。

② 除沈兆霖差赴蘭州，實際上未入值外，同治元年六月桂良亦下世。

③ 同治五年十月李鴻藻為抗奪情而乞病罷，左都御史汪元方以南人而入，與三月接替下世之曹毓瑛入值的胡家玉成二南士之局。惟胡家玉十二月即因受饋官文而去，汪元方於同治六年十月即卒，而有沈桂芬之入值。其次則光緒四年王文韶之為沈援入，至六年李鴻藻復起，沈桂芬下世，左宗棠短期入值，二南士之局亦斷續存在二年餘。此外則光緒八年，王文韶求去，翁同龢、潘祖蔭同以南士被命入值，一時亦有二南士之局，但潘一個月後即因父喪丁憂。南北各一之局面，雖有以上三次特例，但皆為時甚短，且皆為過渡耳。

④ 李只於同治五年、光緒三年兩度因丁憂出樞，但起復後皆立召入值。

僚反對，引起另一波政潮，而其時丁憂之李鴻藻與彼輩一向親近，甚且被認為可能在檯面下參與其議<sup>①</sup>，更深化了恭王對李鴻藻及其後北派的不滿。考諸恭王在往後累次南北政爭中的傾向，此一看法應該不祇誇詞。

也正是在這一年，此後成為南派領袖的沈桂芬也進入了軍機。自曹毓瑛在同治五年（1866）去世，軍機中之南士歷胡家玉、汪元方，一直未能久任，沈桂芬的入樞行走，才結束了此一局面。直至光緒六年（1880）除夕，沈氏病逝之前，始終未出軍機。加以沈氏甚諳官箴，深得慈禧寵信<sup>②</sup>，又以善理洋務而為恭王倚重，成為南派領袖，在軍機中較李鴻藻局面更開，自然不令人意外。南北派系之格局，也到此以沈、李二人為核心，開始確立。本文的第二章“李、沈入樞與南北派系的發展（1865—1867）”，即以南北核心領袖由過渡到確立，及其間的幾場政治糾紛為主要内容，尤其着重論述恭王與李鴻藻無法親近的初因，相對於此，沈桂芬的個人特質及識見能力，更加大了天平兩端的落差。

本文的第三章為“南北之爭的白熱化（1870—1878）”。自沈、李二人成為漢士大夫在決策核心的代表，久居其位，南北派系由隱而顯，完成凝聚，並進入以具體政策差異，開展權力對抗的階段。由同治九年（1870）“天津教案”開始，沈、李在軍機中的政見對立漸見明顯，也在此事件中，李鴻藻感受到了其在軍

---

① 李鴻藻在朝之日，一時與倭仁等為理學正統之唱和，關係匪淺。此事起時，李以乞病而實守制在家，翁同龢之日記中，即屢見彼或倭仁與李商議對策之記載，李宗侗編：《李鴻藻年譜》，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0年版，中亦多有載及。

② 出身左宗棠西征幕府的吳觀禮（圭庵），每喜以詩作月旦朝中大老，其有“小姑篇”，專詠沈桂芬，箇中描繪沈氏侍慈禧之姿態，甚見傳神。見郭則澐：《十朝詩乘》，學生書局1976年版，收入吳相湘主編《中國史學叢書續編》第四冊，第2013頁。

機中的孤立與恭王的傾向<sup>①</sup>，在一定程度上，這也形成了北派此後在野性格及好搏擊恭王府的特徵。此一特徵，延續到光緒三年（1877），終於成為朝局動蕩的一股原動力，從此南北之爭無寧日矣。主要因為在這年九月，李鴻藻因丁本生母憂，再度退出軍機。按自同治初年所形成之平衡局面，應由北士進入頂替或過渡，但延至光緒四年（1878）二月，在沈桂芬的私心與恭王及寶璽的支持下，沈的門生，原任湖南巡撫的王文韶得到內召，並入軍機學習行走。王為浙江仁和人，此一安排，不啻使北派被實實在在地排出權力核心，成了決策圈的在野派。這已不只是李鴻藻個人的得失，而是北派自同治以來所面臨的最大變局。正是在這種局面下，北派以翰詹科道官僚為主的第二梯隊成員，奉在野的李鴻藻為宗師，漸漸形成了一股以清議論政，並搏擊現決策核心的勢力，這便是近代史上為人熟知的“清流黨”或稱“清流集團”<sup>②</sup>。嚴格說來，“清流”形成的時間，不應以光緒四年（1878）為認定，因為其主要成員在此前即已有在言路上活躍的情形，此與李鴻藻及北派在軍機中的孤立應有其關連。只是以南北派系鬥爭論，“清流”在此後對南派的搏擊才更見激烈，而其將對此後南北格局之崩解扮演關鍵角色的作為，也在此後才愈見突出，此是後話。不過，“清流”主要成員中，南北比例的不顯，也再次呼應了作者前此對於明、清兩代，以地域為本的派系，因科舉制度

① 翁同龢其間日記中有“是日軍機起極長……蘭翁（李）頗被排擠。大抵所謂一日不朝，其間容刀也”之記載。見翁同龢：《翁同龢日記》第2冊，同治九年庚午（1870）八月十二日條，中華書局1989年排印本，總第795頁。

② 辜鴻銘曾有《清流傳：中國牛津運動逸事》（*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*）（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）一書流傳。書中以“清流黨”比英國高派教會攻擊自由主義之“牛津運動”，以為“清流”所反者，乃李鴻章及中國自由黨人所贊許的，來自外國的生活方式和標準，致力於淨化國民生活潮流，號召復興孔教，並以張之洞為典型。此一說法，無論就“清流”之本質、基本思想或政治對象，都令人有過於疏闊之感，順此一提。

之完備，而成分愈見盤根錯節的說法。唯就領導人而言，地域因素仍十分明顯。

李去王來，激化了南北兩派間的對抗，除“清流”的彈擊愈顯積極集中外，光緒四年（1878）十月的另一事件，則更表現了北派在失却一城後，力圖扳回局面的用心之切。此即驚詫樞臣，傳為異談的“沈桂芬簡黔撫案”。此案雖因與體制不侔而終未成事實，畢竟對沈桂芬與南派來說，是經歷一險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也傳達了一種警訊，北派的人脈，較想象更廣。事實上，此次簡撫事件，在檯面下運作者，即與李鴻藻甚親近，而與沈桂芬久有心結的滿員大吏榮祿<sup>①</sup>。為此，榮祿與沈桂芬展開了一場政治暗鬥，最終以榮祿之挫敗而暫告一段落。榮沈之爭，一直不是受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注意的片段，但此一事件，却展現了南北派系鬥爭的多元樣貌。當然，雙方緊張關係的再升高，便愈不可避免了。榮祿對沈桂芬祿計，反映南北兩派的角力，已由政見差異與政策主導權的爭奪，進入了可求以非常手段，打擊對手地位的階段<sup>②</sup>。一旦及此，雙方在政治壇場中，尊重彼此謀國忠誠的基本風範，可謂蕩然矣。既如此，自可無所不用其極，競爭規模亦愈見脫軌，終致黨派意氣，高過士大夫基本格調，甚且高過對國家利益的考量。觀諸光緒五年（1879）以後兩大對外決策——“中俄伊犁交涉”及“中法戰爭”——形成的過程，似更可感受到此種轉變。

#### 第四章“派系對立的再升高（1879—1882）”將以光緒五年

<sup>①</sup> 陳夔龍：《夢蕉亭雜記》，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卷一，第55頁，總第113—114頁有“文正（李鴻藻）與文定（沈桂芬）不相能，頗右文忠（榮祿）”之語。陳氏為有清最末位直隸總督，出於榮祿門下。該書據彼稱所載多聞自榮祿。

<sup>②</sup> 詳見林文仁：《由沈、榮之爭看影響晚清政局演變的兩個因素》，收入《史學集刊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《史學集刊》編輯委員會，1996年11月）第65期，第43—49頁。



（1879）到光緒八年（1882）間的兩件大案為觀察點，來看南北派系在此期間對立關係的擴大，一為“崇厚使俄案”，一為“雲南報銷案”。在此兩案中，南派幾全處於被動地位，而北派則以近於在野之利，不斷為攻訐行動加溫。崇厚使俄交涉伊犁返還，結果近乎辱國，此已堪稱一等一的大案，足令言路上磨刀霍霍，更重要的是，崇厚之久任洋務及此次得為使俄代表，全係沈桂芬力保<sup>①</sup>，其足為攻伐南派之口實，已毋須多言。事實上，崇厚自出發使俄，因由海路而不由陸路往，便已招“清流”奏劾。前後連繫，時人亦見其中“項莊舞劍，意在沛公”之蘊也<sup>②</sup>。相較報復榮祿時的彈冠相慶，沈桂芬此時不但須招架清議之激切，尚須為因崇厚下獄而緊張的中俄關係找出路，自是低迷辛苦。南北兩派之氣勢亦自此而消長，攻守異位。尤其在光緒六年（1880）正月，李鴻藻服闋復出，並奉旨仍回軍機，北派在占着優勢的情形下，重入決策核心，加以與李鴻藻有兄弟之盟的景廉，至此已在軍機歷練近四年，更有補李氏過去在軍機中孤立的局面。已是處境大異，偏在這年除夕，久居南派宗首的沈桂芬病逝，一下子將仍在軍機居於班末的王文韶，推到了承當北派鬥爭的最前綫。言路之尖銳已是難防，同列樞垣，並為派首的李鴻藻，其威望與政治經驗又皆非王文韶可及。北派“勢力大增”<sup>③</sup>，而傾軋之習已不可收，光緒八年（1882）矛頭指向王文韶，而有“雲南報銷

① 使俄代表誰選，事前軍機與總署皆有討論。初有以曾紀澤出任之議，終因沈桂芬之力薦而擇定崇厚。見李鴻章《復曾劄剛星使》函，收入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文海出版社1962年影印版，第四冊，“朋僚函稿”，卷19，第22頁，總第421頁。

② 林紓《鐵笛亭瑣記》中，有載梁鼎芬草疏攻薦崇之沈，即一例也。高陽（許晏駢）《翁同龢傳》，遠景出版公司1986年版，第111頁，談及此事，即引其文。此外，《翁同龢日記》中，亦載“清流”成員盛昱上疏及王仁堪等二十二人聯名上書，主殺使臣，而“旁及於保薦使臣之人”。見《翁同龢日記》第三冊，光緒五年己卯（1879）十二月初五日條，總第1462頁。

③ 見《李鴻藻年譜》上册，第310頁。